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藏蒙古文写本与木刻本

[俄] Л. С. 普奇科夫斯基¹ 著

李梅景² 译

(1. 前苏联科学院 东方写本研究所, 前苏联 列宁格勒 191186;

2.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收藏蒙古文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蒙古学研究领域成果突出。原文是苏联著名学者 Л. С. 普奇科夫斯基半个多世纪前对苏联藏蒙古文文献来源、构成、价值等情况的梳理研究。追本溯源理清俄罗斯蒙古文文献的收集史, 对于蒙古学研究大有助益, 今译介俄语原文以供参考。

关键词: 蒙古学 东方学 俄藏蒙古文文献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3-0156-21

何时及由何人开始收集蒙古文文献资料的问题, 对于俄罗斯蒙古学学术史研究非常重要。然而, 目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蒙古文写本和木刻本的收集史只能笼统地追溯,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文献和档案资料中提供的信息不充足, 且不清楚。^①

东方学是俄罗斯科学的一个分支, 创建于 18 世纪。俄罗斯发展东方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加强俄罗斯与近东和远东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杰出的俄罗斯科学家 М. В. 罗蒙诺索夫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其兴趣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的知识领域, 包括东方学。他认为应该在圣彼得堡大学建立三个系: 法律系、医学系和哲学系, 并且哲学

收稿日期: 2019-09-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俄藏蒙古文文献目录译介与研究”(18ZDA3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901090); 2020 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2020jbjd002)

作者简介: Л. С. 普奇科夫斯基 (1899-1970), 男, 前苏联蒙古学家。主要从事俄藏蒙古文文献整理与研究。

译者简介: 李梅景 (1989-), 女, 安徽蚌埠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① Л. С. 普奇科夫斯基 (Л. С. Пучковский)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蒙古文写本与木刻本 (Собрание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东方学院学术论文集·卷九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том IX)》, 1954 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第 90-127 页。鉴于原文篇幅较长, 译者在尽量呈现原文完整内容的基础上, 舍去了注释部分。

系的教授中要包括有“东方语言、古物”的教授。M. B. 罗蒙诺索夫认为，东方学应该在科学院，甚至是在特殊的东方学机构中被研究。考虑到俄罗斯与亚洲的密切关联，M. B. 罗蒙诺索夫如此广泛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学术人员中没有涉及（东方语言教授），因为那时还没有东方语言教授，虽然周边也没有这样的教授，但是其对全体东方学院都将有益。”

随着纯粹的东方语言教学实践任务的产生，科学兴趣由此兴起，首先表现在收集有关东方国家和其民族语言资料的工作上。

在额尔齐斯的阿布赉寺（Аблай-хит）废墟中发现的蒙古文和藏文写本和木刻本被运到了彼得格勒，很可能是根据彼得一世 1718 年 2 月 13 日的法令，“召集畸形及不寻常的物件”。法令也包括“石头、铁和铜上的古旧题记，及其他所有非常古旧、不寻常的物件”。И. 巴克梅斯捷尔（И. Бакмейстер）称这些写本是在 1720 年送来的，但他没有提到这个日期的来源，也没有提供有关这些资料被发现情况的其他信息。

应该注意的是，Б. 多恩（Б. Дорн）称“1720-1 法令是彼得大帝对西伯利亚省长发出的将罕见和有趣的物件转移到珍藏馆的命令，”没有提及来源，也不准确。实际上，发给西伯利亚省，以及矿务总局和工场手工业委员会的 1720 年和 1721 年法令提到了购买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金器的问题。

很有可能东方收藏包括蒙古文写本资料的收集，受到了以下法令的极大推动：1720 年 12 月 20 日“从俄国国家修道院寄发特许证”和 1722 年 2 月 16 日“将所有教区和修道院的古代写本和类似书籍寄送到莫斯科的主教公会”。

Д. Г. 梅塞施密特（Д. Г. Мессершмидт）也在从事蒙古文资料的收集，包括通古斯文和汉文写本收集等。这位旅行者的日记中记录（1724 年 5 月 20 日）他曾委托喇嘛卡拉班迪（Карабанди）寻找蒙古文和其他写本。然而，这位喇嘛收集的资料被认为“不值得其花费的努力”（1725 年 3 月 19 日记录）。尽管如此，Д. Г. 梅塞施密特 1728 年从西伯利亚返回时还是带回了蒙古文和藏文资料。尚未找到这些资料，只有一处模糊地提及其中的一些藏入了科学院。

П. С. 帕拉斯（П. С. Паллас）也对阿布赉寺废墟中的蒙古文和藏文资料感兴趣。他本人没有去过这个地方，而被他派遣的 Н. 索科洛夫（Н. Соколов）只向他提供了“其能够从这座寺院大殿的垃圾中获取到的腐烂的写本残片”。关于这些资料 И. 巴克梅斯捷尔曾简要提及，“这些写本的其余部分已经由五等文官参赞米勒（Миллер）先生和帕拉斯教授在西伯利亚期间收集”。

所有这些资料的获得使 И. 巴克梅斯捷尔相信“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大量西夏文和蒙古文写本”。但是，据他说“由于对这些语言的无知，我们没有关于写本的更多信息”。随后，精通蒙古文并从事蒙古文写本和木刻本收藏的 И. 伊耶里格（И. Иериг）研究了这些资料。毫无疑问，他能够比 И. 巴克梅斯捷尔更准确地确定这些资料的价值。И. 伊耶里格发现“蒙古人的智慧，И. 巴克梅斯捷尔对此赞美有加，它体现在一些碎片

中,它们值得保存可能因为它们已经被保存下来了”。И. 伊耶里格尽可能地整理了它们,然后“它们不得不让位给新的外来物”。其中一些,显然是保存最好的,后来根据“泽列目录(Каталог Зере)”的分类成为蒙古文写本藏品集 I 的组成部分。很可能“新的外来物”是由 И. 伊耶里格花费数年时间科学院收集的蒙古文写本和木刻本,他在 1789 年编制了这些资料的清单。它们包括以下资料:藏文的(编号 1-12),藏文和蒙古文的翻译(编号 13-24),以及蒙古文的(编号 25-163)。清单指出了他们的标题或是用几句话说明其内容。此外,他提到的少量零散的单页,没有说明。

蒙古文写本和木刻本以及东方语言的其他资料随后被转移到 1818 年 11 月 11 日成立的亚洲博物馆(最初称为东方研究室),X. Д. 弗伦(X. Д. Френ)在其关于亚洲博物馆现状的初步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

И. 伊耶里格编制的蒙古文清单中的资料,根据“泽列目录”,构成了蒙古文写本藏品集 I,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资料“在伊耶里格之前就已经在当时的科学院图书馆东方分部了[?]或由伊耶里格捐赠,他亲笔描述了很多”。在编译“泽列目录”时使用了 И. 伊耶里格的清单,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在“目录”中,基本保留了由 И. 伊耶里格给出的划分和编号:“A) 藏文-蒙古文作品”(编号 13-24);“B) 蒙古文作品”(编号 25-163)(参见前文);И. 伊耶里格补充的零散纸页(参见上文)未列在“目录”中,取而代之的是“C) 增补目录”(编号 1-7);以及“D) 属于这一收藏的没有编号的书籍”(x1-x5)。

很可能 19 世纪前 25 年的收集构成了蒙古文写本藏品集 II 的写本。“这一藏品中大部分是卫拉特文小写本,其入藏时间可追溯到博物馆成立的头几年,但不知道哪一年及从谁那里购得。”该藏品包括:“A) A. B. 波波夫(A. B. Попов)编号的 1-75 号书籍,以及 B) A. B. 波波夫在 1849 年编号的书籍”。

根据 X. Д. 弗伦 1829 年编写的亚洲博物馆简述,在东方资料中有 180 个单元的藏文、蒙古文和卫拉特文作品。

根据 Б. 多恩的说法,这些作品入藏于 1833 年,共有 207 个单元,其中 27 个于同一年抵达。上述 27 个单元的藏品可能是“由年轻的福斯(Фус)先生 1833 年(?)在北京购得的书籍”。这些资料构成了蒙古文写本藏品集 III,根据 И. Я. 施密特(И. Я. Шмидт)编制的清单,它包含 1-18 号。

1835 年,И. Я. 施密特藏品集 I 入藏亚洲博物馆,由中文、满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语言的 314 部作品构成(2600 多个存储单元)。同年,И. Я. 施密特简要介绍了这一藏品,指出最有价值的是蒙古文作品。这一藏品中蒙古文作品的数量很少,只有 19 件。它们构成了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藏品集 IV。

同年,亚洲博物馆收藏了彼得·卡缅斯基(Петр Каменский)的 43 件藏文和蒙古文藏品,其中蒙古文作品仅有 13 件。它们构成了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藏品集 V。

1838 年,И. Я. 施密特(在他 1837 年去世后)藏品集 II 被转存到亚洲博物馆。据

Б. 多恩所说,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他的藏品集 I。И. Я. 施密特的藏品集 II 是从 А. В. 伊古姆诺夫 (А. В. Игумнов) 处购得,其拥有“庞大的蒙古文图书馆”。这一藏品中的一些写本和木刻本上有 А. В. 伊古姆诺夫的亲笔标注,例如:“1800 年获得。通过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伊古姆诺夫兄弟自宗果神庙 (Цонгольское капище) (获得)” ; “印有当着我的面用木头刻板雕刻成的奇科伊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宗果小庙…… [?] 18. 7. V. 29,” 等等。И. Я. 施密特编写了该藏品的藏文和蒙古文作品的初步清单。А. В. 伊古姆诺夫收藏的蒙古文作品构成了蒙古文写本藏品集 VI。根据“泽列目录”,其包含 166 个存储单元,但标题的数量略少于这个数字,因为一个标题包含一部作品的几卷,以及一些副本。

1840 年,数部藏文作品与一部蒙古文作品入藏了亚洲博物馆。根据“泽列目录”,这是“1840 年由 В. П. 瓦西里耶夫 (В. П. Васильев) 在北京为亚洲博物馆购买的书籍”。

1847 年入藏“泽列目录”的蒙古文资料,被标记为“施密特院士继承人捐赠的亚洲博物馆图书馆馆藏书籍”(编号 1-47)。它们构成了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藏品集 VIII。

据 Б. 多恩叙述,1863-1865 年间亚洲博物馆藏有 390 件蒙古文写本、562 件藏文、藏文-蒙古文写本,以及其他写本和木刻本。这些非常普通的数据表明当时尚未形成蒙古文写本的收藏。显然,不可能在这方面确定一个确切的日期。

1864 年,外交部亚洲司向亚洲博物馆转交了大量东方资料收集品。此次收集品的原始构成可以从蒙古文的印刷目录得知,其中蒙古文作品编号是 457-499。这些蒙古文作品构成了蒙古文写本藏品集 IX,并作为“(印刷)目录方面的著作”列入“泽列目录”中。

在以下东方资料的收集品中,包括蒙古文资料在内,亚洲司给予了大量补充。这些补充品也被转移到了亚洲博物馆,蒙古文资料包含在蒙古文写本收集品中。在“泽列目录”中它们被标记为“[印刷]目录附录作品”(编号 1008-1036a)和“[印刷]目录增补”(编号 6-10 和 31)。

关于入藏亚洲博物馆的蒙古文写本藏品集 X,“泽列目录”没有提及。只是要注意的是,构成这一藏品集的“书籍,无法确定属于上述哪一个藏品集”。这一藏品集的编号是 1-23。

还有其他一些后来收入蒙古文写本合集中的藏品,目前尚无法确定入藏亚洲博物馆的时间,例如喀山神学院收藏品 6 (编号 1-453)。可以假设,这部分收藏品于 19 世纪下半叶入藏亚洲博物馆,此后,1855 年彼得堡大学开设了东方系,东方语言的教授从喀山大学转移到了彼得堡大学。1855 年 9 月至 1857 年 3 月东方资料(包括蒙古文资料)从喀山转移到了这里。

还没有关于亚洲博物馆入藏 А. М. 波兹涅耶夫 (А. М. Позднеев) 收藏品 (编号 1-401) 的准确信息,很可能是在 19 世纪末 А. М. 波兹涅耶夫 1892-1893 年最后一次蒙

古之行归来后。

К. Ф. 戈尔斯通斯基 (К. Ф. Голстунский) 于 1899 年逝世, 大概到了 20 世纪初他的收藏品入藏亚洲博物馆 (编号 1-48)。

自 20 世纪初开始, 亚洲博物馆开始收藏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的收藏品: 藏品集 I (编号 1-17), 收集于 1903 年, 1904 年入藏。藏品集 II (编号 1-63), 收集于 1904 年, 1905 年入藏。根据登记记录, 藏品集 III (编号 1-131) 1911 年入藏, 藏品集 IV (编号 1-9) 1914 年入藏。

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的收藏品按以下序列入藏: 藏品集 I (编号 1-36) 1914 年入藏, 藏品集 II (编号 1-43) 1915 年入藏, 藏品集 III (编号 1-11) 1925 年入藏, 藏品集 IV (编号 1-23) 1929 年入藏, 藏品集 V (编号 1-16) 1927 年 (?) 入藏。

1925-1937 年间收藏品 “Mongolica nova” (编号 1-498) 形成。一些来自个人和 (某些情况下) 来自科研机构的罕见写本和木刻本被合并在该藏品集中。上面列出的藏品集主要是蒙古文写本和木刻本。布里亚特-蒙古文资料主要收入在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 1935 年布里亚特-蒙古文藏品集 I (编号 1-59) 和藏品集 II (编号 1-86)、1936 年入藏的 С. Д. 德雷科夫 (С. Д. Дылыков) 藏品 (编号 1-81)、最后 (1948 年) 入藏的 Д. А. 阿列克谢耶夫 (Д. А. Алексеев) 藏品 (编号 1-28) 中。蒙古文写本收藏品内容非常丰富多样, 这主要取决于这些资料收藏者的需求, 以及 18、19 世纪佛教文献在蒙古最为常见, 因此最容易获取到。由于这些原因, 佛教著作构成了蒙古文藏品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藏品集 I-X。藏品中还包括历史、布里亚特法典、医学、天文学作品等。例如, 在喀山神学院收藏品中的大量佛教作品中有历史作品、关于 18 世纪上半叶边界问题的一些文件、致 О. М. 科瓦列夫斯基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的信件集、语法著作、词典等。

在 А. М. 波兹涅耶夫的收藏品中, 除了众多的佛教著作外, 还有蒙古和卫拉特历史作品, 蒙古、卫拉特和布里亚特民间传说的资料, 内蒙古和外蒙古诸王公关于偿还债务的信件集 (19 世纪末), 官方文件样本等。

在 К. Ф. 戈尔斯通斯基为数不多的收藏品中有卫拉特历史作品、立法文献, 以及民俗资料。该收藏品中约有一半是由 К. Ф. 戈尔斯通斯基的小文章和他指导下的学生作品 (带有注解的翻译等) 组成的。所有这些资料都被转存到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档案馆。

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藏品集 I 主要是布里亚特和蒙古民俗的, 同时还有一些深受喇嘛教影响的萨满教信仰和仪式的作品。

藏品集 II 中最有价值的写本是关于霍林斯克的布里亚特人的历史, 由 В. 尤姆苏诺夫 (В. Юмсунов)、Ш. 霍比图耶夫 (Ш. Хобитуев) 和 Т. 托博耶夫 (Т. Тобоев) 编写。

从鄂尔多斯带回的藏品集Ⅲ是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其中包括一些蒙古文编年史,以及一些蒙古人历史方面的作品。此外,还有很多民间文学方面的资料(谜语、谚语、俗语),以及史诗和萨满教的资料。在藏品集Ⅳ中应该对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史和中国小说翻译成蒙古文的作品加以注意。

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藏品中最有价值的是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史诗《格斯尔(Гэсэр)》一些章节的卫拉特文记录,以及一些汉文历史小说的蒙古文翻译。

“Mongolica nova”收藏品内容非常丰富多彩:有蒙古、布里亚特、卫拉特的历史著作,行政指令集,官方通信样本,证书,出行证件;个人信件,民俗资料,《格斯尔》的个别章节;占卜、预言汇编,等等。

1935年的布里亚特-蒙古藏品集Ⅰ包括几篇关于霍林斯克布里亚特人的历史文章、笔记、谱系和1823年布里亚特-蒙古法典抄本等。还包含有最新的资料,例如,“1919年征召问题方面的各种文件汇编”。

1935年布里亚特-蒙古藏品集Ⅱ主要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婚礼、新年和其他习俗描述;歌曲、谜语记录;预兆、预言、占卜等。

在С. Д. 德雷科夫收藏品中同样有各种霍林斯克的布里亚特人的历史作品和草原法令汇编方面的资料。

在С. Д. 德雷科夫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资料是布里亚特人的谱系和民间传说记录。

通过对蒙古文写本藏品集简要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它的各种藏品中有同一性质的作品和资料。因此,似乎有必要结合它们的题材指出那些包含有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卫拉特人的历史,其立法、史诗、民间文化、民族学、文化史方面最有价值信息的写本和木刻本。

蒙古文资料的大多数收藏家都对历史作品感兴趣,几乎我们所有藏品集中都有历史作品。蒙古封建史学最早的古文献可以追溯到17世纪。在我们的收藏中,它们被列入18和19世纪的清单中。

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应该要提到《Хад-унундусун-у эрдэни-ин тобчи》,即《蒙古源流(Драгоценный свод сведений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ханов)》。对于东方学家而言,这部著作的作者萨冈彻辰(Саган Сэцэн)之名要更加知名。主要抄本有四个小笔记本。笔记本Ⅱ、Ⅲ和Ⅳ的标题页上有“Монгол хад-ун туджи”的标题,即《蒙古诸汗史》和题字(18世纪的笔迹)“诺沃肖洛夫(Новоселов)藏书”。

О. М. 科瓦列夫斯基也曾试图“寻找到……彻辰编年史,并为喀山图书馆购买……根据大学理事会的指示……”然而,他从А. В. 伊古姆诺夫那里了解到“彻辰编年史”的4本笔记本的抄本在1795-1807年间已由瓦西里·诺沃肖洛夫在北京购得。布里亚特人1816年从他那里获得了该抄本及其他一些书籍,他们被请到彼得堡在И. Я. 施密特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工作。根据О. М. 科瓦列夫斯基的说法,“施密特先生获取了布里亚特人的书籍,其中包括彻辰编年史”。根据其他消息称,这份写本的原件于1808年由居

住在北京的俄罗斯神学院代表团的学生瓦西里·诺沃肖洛夫带到了布里亚特人那里，并于1814年被霍林斯克的布里亚特人斋桑诺姆图·乌塔耶夫（Номту Утаев）和巴德玛·莫尔舒诺夫（Бадма Моршуннов）带到了彼得堡。在他们那里他“有过一个绰号伊萨克·雅库布·西米德（Исак Якуб Симид）”。

还要指出的是，显然，当这份写本在布里亚特人那里时，在И. Я. 施密特出版这份写本前，由某位塔陶罗夫（Татауров）将它译成了第一份俄语译本。萨冈彻辰著作与蒙古语的起源和写作有关问题的几个段落的翻译由И. Я. 施密特于1818年发表。1829年该作者发表了此抄本全文，并附有翻译和大量评论。但是，И. Я. 施密特根据自己的判断将作品分为了十个部分，没有遵照原作。同时，写本分为的四个笔记本并未在该出版物中得到反映。这份抄本，以及其他蒙古文资料被科学院1847年从И. Я. 施密特的继承人手中收购。

这部著作的另一件抄本是布里亚特人的抄件。通过对比这两份抄本，可以看出该抄件再现了原件的所有错误。如果我们考虑到О. М. 科瓦列夫斯基的信息，А. В. 伊古姆诺夫“尽可能明确无误地抄写了彻辰编年史的4个笔记本的写本，甚至保留了最不可原谅和明显的错误……”，应该假定该抄本是“在伊古姆诺夫先生的个人监督下改写的……[萨冈彻辰]编年史。”此抄本以及А. В. 伊古姆诺夫持有的其他写本和木刻本由П. Л. 希林格（П. Л. Шиллинг）获取，然后作为希林格藏品集Ⅱ的一部分转存到了亚洲博物馆。

从鄂尔多斯带回来的这部著作的另一件抄本题名为“Хаган-у шара дэбтэр”，即《帝王黄册（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желтая книга）》。它包含一些附加内容：“特别是在末尾，而不是在跋中，提到了一条有关1662年事件的信息，而上述第一件抄件的是1651年。”

除了这些完整的萨冈彻辰著作的抄本外，还有一些零碎的抄本至今尚不为人所知。其中一件（F212）没有标题，只包含印度和西藏王统。它的叙述要比В. 诺沃肖洛夫提供的抄本更为详细。

还有一件抄本（以卫拉特语改编）有关成吉思汗的祖先，以及他在登上王位之前的故事。这些内容在写本E79中占据了几页，该写本是各种文学作品的摘录。

闻名学界的缩写为“Алтан тобчи”，即编年史《蒙古黄金史（Золотой свод）》，其抄本也是蒙古文宝藏中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

根据П. С. 萨韦利耶夫（П. С. Савельев）的说法，这部编年史“是我们在北京的神学使团成员发现并将两份抄本带回到俄国的：一份在外交部亚洲司的图书馆，另一份在喀山的О. М. 科瓦列夫斯基教授处”。

亚洲司收藏品中的上述抄本于1864年转存到了亚洲博物馆。在这份抄本上标记有“亚洲司图书馆藏”，标号“1017”——显然这是此写本在该图书馆的编号。这份抄本在“泽列目录”藏品集Ⅸ中也是这个编号。据报道，“学者道尔吉·班扎罗夫

(Дорджи Банзаров) 很早就醉心学术, 打算出版这部编年史……”, П. С. 萨韦利耶夫指出: “这项工作现在已经由嘎拉桑·贡布耶夫 (Галсан Гомбоев) 完成……根据现藏于亚洲司博物馆的写本……并且由该司提供给考古学会出版”。抄本 G26 是著名版本《蒙古黄金史》的原版。这件抄本中有许多拼写错误和笔误。其中一些已由出版商标注出来并部分更正。该抄本其他不清楚的地方,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已出版的文本和翻译。

在这部著作的另一件抄本 F25 的扉页上有一处标注: “北京 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 (Николая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1827 年 5 月 28 日”, 很可能是 Н. И. 沃兹涅先斯基的笔迹。可能这件抄本是由 О. М. 科瓦列夫斯基于 1830 年抵达北京时在北京所获, 从他那里转存到了喀山神学院图书馆 6 馆藏中, 后又转藏入亚洲博物馆。此件抄本的文本完全与前一件抄本一致 (显然, 两件抄本都出自同一原件), 但是拼写明显比前一件更好。《蒙古黄金史》抄本是写本 F25 的主要部分 (11a-147 b 页)。F25 还包含其他一些资料。所有这些都由 Н. И. 沃兹涅先斯基抄写, 并且很可能都属于他: 1) “译自《庭训格言 (Тин сюнь гэ янь)》, 即康熙 (Энхэ-амугулан) 对诸皇子的训诫”, 册 2, 训诫 1-9, 11, 12, 14-19 (第 1a-9b 页)。2) 一篇非常短的关于“小布哈里亚”张格 (Джангер) 1825-1828 年反抗满族军队压迫当地居民起义的短篇小说 (148a-151a)。3) 康熙“指令”[训诫]——60, 10, 61, 56, 13 (152a-154b)。

抄本 F12 (显然是第一件抄本的副本) 并不具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有很多错误和错字。

还有一件写本 (F24), (И. 伊耶里格的笔迹) 蒙古文标题《Чингис-хаган-утуджи》, 即《成吉思汗史 (История Чингис-хана)》(从他登上王位到他去世), 是否是《蒙古黄金史》的摘录目前尚不清楚。

F125 是一件小写本, 是否是“《蒙古黄金史》第四册第二部分第三页的摘录”尚未知, 其中包含非常简短的蒙古和卫拉特部落的资料,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卫拉特部落起源的传说, 还列出了从成吉思汗到 17 世纪后期他们的可汗, 有些甚至到 18 世纪初的。所有这些信息与编年史《黄史 (Шара тутжи)》的相应部分中关于蒙古族和 (主要) 卫拉特部落及其可汗的信息有很多共同之处。

《黄史》是 17 世纪蒙古封建史学中最重要的古文献之一, 在我们的收藏中有两件抄本。一件 (B200) 由 В. В. 拉德洛夫 (В. В. Радлов) 1891 年从鄂尔浑考察带回。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在科学研究中介绍了这部名为拉德洛夫《史》或《拉德洛夫史》的著作, 并在其作品中反复使用。

这部著作的另一件抄本 (F264) 主要部分 (2a-366 页) 与前一件抄本的第一部分完全吻合。抄本的末尾 (366-416 页) 给出了成吉思汗诸子及诸弟后代, 关于蒙古和卫拉特部落, 以及他们的可汗的信息等。它们以不同的顺序叙述, 并且有时比抄本 B200 更简短。因此, 该抄本可以被认为是《黄史》的特殊版本。

17 世纪的历史著作还包括完成于 1639–1640 年的满文版《元史》的蒙古文译本。这件译本的完整抄本（F309）名为“Дай Юань улус-ун бичик”，即《大元国书（Книга великой Ю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是在鄂尔多斯抄得的副本，由 15 本每本平均 40 页的笔记本组成，尺寸为 26 * 26 厘米。另一件不太完整的抄本（G45）题名为“Юань улус-ун бичик”，即《元国书（Книга Ю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由 6 本每本 30 页的笔记本组成，尺寸为 33 * 22 厘米，1831 年完成抄写。

藏品中还有一件蒙古历史的写本（F238）。开头是非常简短的印度和西藏诸王的历史，以及成吉思汗的祖先到朵奔篾儿干（Добо-Мэргэн）的谱系（1 页）。如文中所述，此信息是《蒙古黄金史》的摘录。其版本与我们这部作品的抄本以及罗卜藏丹津（Лубсан Дандзан）的《黄金史》（蒙古文馆藏，照片 B90）完全不同。成吉思汗的祖先及其历史（2–5 页），接着是元朝皇帝到妥懽帖睦尔（Тогон Тэмур）的历史（5–30 页），然后列出达延汗（Даян-хан）及其子孙。非常详细地叙述他们的后代，出自他们的内蒙古一些旗的王公，包括鄂尔多斯的七个旗（30–32 页）。这部作品的作者很可能是鄂尔多斯的一位王公。至于这部著作的撰写日期，只有间接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顺治（Эйэбэр-дзасагчи）七年（1650）有一位王公成为了满族公民，之后列出了他的子孙，可以假设该作品是在 18 世纪上半叶完成的。我们的抄本是在鄂尔多斯抄得的一件副本（16 页，笔迹非常精细，尺寸 27 * 21 厘米）。

18 世纪的另一部历史著作，标题《Ганга-ин урусхал》，即《恒河之流（Течение Ганга）》（F294，30 页，尺寸 26–24 厘米）。这篇简短的历史谱系文章详细介绍了朵奔篾儿干到林丹汗（Лэгдэн-хан）的蒙古可汗的主要谱系。并且记录的成吉思汗、忽必烈（Хубилай）和其他元朝皇帝的第一代继承人的后代比萨冈彻辰的和其他 17 世纪的编年史更为详细。而有关术赤（Джочи）、察合台（Чагадай）的后裔，及其兀鲁斯构成信息与史实不太对应。接着是从必里克图汗（Биликту-хан）到林丹汗，并列出了也速该（Иесугэй）、术赤、察合台和忽必烈的后裔，及其在中国统治的领地。进一步展示了蒙古可汗主线代表的内蒙古诺颜的起源，例如，林丹汗系的察哈尔诺颜，鄂尔多斯的——出自达延汗第三子，等等。还报道了组成十万军团（“тут түмэн”）的六个蒙古部落和四个卫拉特部落的情况，所谓的“五色”和“四夷”等等。跋中指出《恒河之流》的作者是衮布扎布（Гомбоджаб），写作日期是雍正（Найралту-туб）三年（1725），史料来源——“《元史》《[通鉴]纲目》，以及其他一些蒙古和中国的编年史、历史作品”。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部著作中有一些关于封建战争、关于封邑、关于蒙古和卫拉特部落等蒙古社会制度历史方面的资料。一些蒙古文封建术语的定义，作者与汉文做了比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资料大部分被 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用过，他还用过该部著作的其他一些资料。

《恒河之流》的一些资料被用在了《Алтан хурдун минган хэгэсүтү》即《金轮千辐

(Золотое колесо с тысячью спиц)》的抄本 F542 中(同一封面的五本笔记本, 尺寸 25 * 25 厘米)。

第一本笔记本(15 页)包含佛教的宇宙观, 然后是从孛儿帖赤那(Буртэ-чино)到也速该巴阿秃儿(Иесугэй-багатур)期间印度和西藏诸王历史、成吉思汗的祖先史; 第二本(13 页)是成吉思汗的历史; 第三本(34 页)关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 简略提到托雷(Тулуй)、有关兀鲁斯, 以及术赤和察合台后代的一些资料(参见上文), 还有从窝阔台(Угэдэй)到林丹汗的蒙古可汗史; 第四本(27 页)是达延汗十个儿子的后代非常详细的谱系; 第五本(29 页)是关于成吉思汗诸弟后代成为大清地方上的王公和诺颜的资料, 然后是所谓“五色”和“四夷”的信息, 关于部落的构成十分模糊, 还有一些卫拉特部落的起源, 其王公谱系等。

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作品的很多处(行间小字)给出了额外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在某些著作中找到。甚至有时这些信息包含在汉文著作中。但是, 出处的标题没有标注出来。在著作最后标注其写作日期是 1739 年, 作者是答理麻(Дхарма)。

援引自这部著作的摘录在著名历史著作《Дай юань болор эрихэ》, 即《大元国水晶念珠(Хрустальные четки [событий] великой Ю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中多次出现, 更为知名的简称是《水晶念珠(Болор эрихэ)》。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 他还参考了“蒙古人著录的历史作品”和数部汉文著作《元史》《通鉴纲目》《续编》等, 以及一些佛教作品。在简短的介绍中, 作者给出了文章五个部分的名称。但是, 这些名称不准确, 并没有充分展现出作品的内容。以下是各部分内容的摘要: I. 蒙古人和汉人史料方面的蒙古族起源问题。II. 出自印度王和藏王的蒙古汗王后裔。成吉思汗的祖先从孛儿帖赤那到也速该巴阿秃儿。III. 成吉思汗, 窝阔台, 及之后诸汗王贵由(Гуюк)、蒙哥(Мункэ)、忽必烈, 以及其他一些元朝皇帝, 直到妥懽帖睦尔。传说永乐帝正是妥懽帖睦尔的儿子。IV. 从必里克图汗到林丹汗的蒙古诸可汗。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孔果尔台吉(Эдзэй-хонгор-тайджи)对清朝的归顺。V. 内蒙古一些旗的诺颜谱系。土默特俺答汗(Алтан-хан)及其后代。达延汗的儿子巴尔斯博罗特(Барсу Болод)和阿勒楚博罗特(Арсу Болод)的后裔。

我们所有的该著作抄本全都没有跋。作者的名字拉西彭楚克(Рашипунцуг), 是依据在很多处发现了他的名字而判定的, 作者引用文献资料的地方表现出其对蒙古可汗历史问题等的看法。

作者在撰写著作期间, 使用的其中一条文献资料来源于乾隆(Тэнгри-ни-тэдхүгсэн)三十五年(1770)。因此可以假设这部作品撰写于 18 世纪最后的 25 年中, 在蒙古文写本收藏品中有这部著作的 3 份写本。其中的一份(F511)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的赠礼, 由 10 本每本 65-75 页的笔记本组成, 尺寸 26 * 27 厘米。另一份(F541)抄写员给出的错误标题《宝贝念珠(Эрдэни-ин эрихэ)》在几本笔记本中重复出现, 共有 18 本每本 25-30 页, 尺寸 29 * 21 厘米。第三份抄本(F540)标题为

《元国书》，20本每本45-50页，4套，尺寸25*12厘米。

在蒙古文写本藏品中还包括有19世纪蒙古封建史文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Болор толи》，即《水晶鉴（Хрустальное зеркало）》，3卷，尺寸25*23厘米。

第一卷有2本笔记本。第一本笔记内容是佛教宇宙观、地球上的第一群人，以及“世界君王（чакравартин-хаганов）”、释迦牟尼（Шакьямуни）传记、其死后佛教在印度的传播（99页）。第二本笔记本的内容是印度佛教历史和印度国王，以及佛教弘法者的传记（91页）。

第二卷的内容是中国的地理描述和从远古时期到被成吉思汗征服的中国帝王史，西藏历史、与佛教历史相关的藏王历史；佛教高僧宗喀巴（Дзонхава）传记（116页）。

在第三卷（156页）的开头部分有关于内蒙古和外蒙古行政建构的简要信息。然后是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描述，主要是杜撰的信息。之后是对神话传说国度香巴拉，以及它的传奇国王的历史的描述。接着列举了那些被视作成吉思汗祖先的印度王和藏王，及其另一些自孛儿帖赤那到也速该巴阿秃儿的祖先。再然后是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的历史，从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到蒙古可汗林丹汗的简史，佛教在蒙古和中国的传播，清朝皇帝至道光元年的历史。这部著作中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1624-1635年间蒙古诸王公对清朝的归顺，以及李自成（Ли Цзычэн）和阿穆尔萨纳（Амурсана）起义的资料。还要指出的是，作者从满族朝廷的利益角度来评价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

跋中援引了诸多史料，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乌拉特的）莫日根格格根（Мэрген-гэгэн）的《黄金史（Алтан тобчи）》和《黄册（Шара дэбтэр）》可能是萨冈彻辰著作的其中一种抄本（参见上文）。

作者没有指出写作的时间，应该注意的是，除了标注的日期（道光元年，1821）外，还提到了道光七年（1827）。除此之外，作者还指出他的作品是从马年到鸡年撰写。最接近的马年日期是1834年，鸡年是1837年。因此可以推测该著作的写作时间是1834-1837年。

A. Д. 鲁德涅夫报道了该抄本的来源，及抄本的内容。该作者显然只是通过其目录转述了著作的内容，然而这些目录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作品的实际内容。

蒙古文写本收藏品中除了《水晶鉴》完整的抄本外，还有这部著作的几件摘录。一件是F159，很小（10页），较有意义的两件——F100（112页）和F141（101页）。还有一件（F255）内容是第一件的第二部分、第二件和第三件的简述。因此，F255的篇幅很大（232页），几乎呈现了整部作品。现有的摘录表明蒙古封建贵族们对这部著作有着极大的兴趣。B.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在两件抄本（F305）和（F255）中使用了这部著作。在蒙古文写本收藏中有一件《Эрдэни-ин эрихэ》，即《宝贝念珠（Четки из драгоценностей）》。该编年史首先列出了印度和西藏王统，其次是元朝皇帝和蒙古可汗的历史，然后是满族皇帝的历史，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A. M. 波兹涅耶夫给出了对这部著作大体上正确的详细描述。这份抄本是用非常小的笔迹抄写，67页，尺寸

很大(26*26厘米)。还有这部著作的摘录(F286, 72页和F297, 92页), 以及目录(1-35章)(B224, 3页)。

还有更晚一些的, 大概是19世纪后25年写成的小作品《Субуд эрихэ》, 即《珍珠念珠(Жемчужные четки)》, 作者是鄂尔多斯乌审旗的协理台吉贡冲札布(Гончогджаб)。这部著作按照传统提纲编写: 印度王历史(1a-3a页)、藏王历史(3b-5a页), 然后以谱系形式描述蒙古可汗(5a-11a页), 其中一些可汗的叙述较详细, 例如成吉思汗、忽必烈、林丹汗。正如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指出的那样, 后者的信息可以追溯到《水晶鉴》。接着是非常简短的清朝皇帝的历史。其中最后一位皇帝称为布伦札萨克汗(Буринту-дзасагчи)(汉文同治, 1862-1874年)(11a-11b页)。作品的最后介绍了内蒙古一些旗的王公(其中包括鄂尔多斯的7个旗)、喀尔喀及卫拉特一些部落和部族的起源(116-136页)。这部著作的抄本(D90, 13页, 尺寸21*27厘米)在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旗抄得。

此外, 在蒙古文写本收藏中还有一些篇幅很小的作品, 作品中只列出了蒙古可汗的名字, 有时会指出与之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日期。

例如, 这些作品中包括《Чингис - хаган - у домоk》, 即《成吉思汗传(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其中列举了印度王、藏王、蒙古可汗和清朝皇帝历史, 以及相关的日期, 直至同治八年(1869)。随后给出了自成吉思汗(据说他邀请了贡嘎宁波 Гунганинбо)到第七世“转世”的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Джэбдзук-дамба-хутухта)(1850-1868)时期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H98(20页, 尺寸9*45厘米)是布里亚特木刻本, 1869年出版。有着相似特征的作品《Богда Чингис-хаган-эцэ инакши найман хаган-у хуриянгуй тухэ》, 即《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八位可汗简史(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восьми ханов, начиная с Чингис-хана)》(B299, 8页), 等等。

与蒙古人历史有关的卫拉特历史在17世纪大蒙古编年史著作中引起了广泛关注。由卫拉特作者专门撰写的卫拉特史籍非常少。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噶班沙拉勃(Габан Шэраб)的著作^①。作品的写作日期是1737年。这部作品包含有关卫拉特历史个别问题的信息, 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例如, 根据В. Л. 科特维奇(В. Л. Котвич)的看法, 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的王公谱系占据了重要位置, 构成了噶班沙拉勃著作的主要部分。此外, 值得关注的有: 卫拉特和蒙古诸王间的内部战争; 诸王公为确立法律法规与建立和平关系的誓约大会; 佛教在卫拉特王公中传播的起源; 他们与西藏的关系; 他们传承给后代的封邑, 等等。作者进一步给出了一些卫拉特王公的特征, 并记述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的事实。关于卫拉特王公与蒙古王公的关系、卫拉特王公间的相互关系的详细信息等, 使得噶班沙拉勃著作在为数不多的卫拉特作品中最具价值。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用了这部著作中的一些事例。

^① 根据上下文此“著作”应该是《四卫拉特史》——译者注。

这部著作的完整抄本 E66 有 8 页, 尺寸 23 * 36 厘米。

另一件抄本 (D118) 的文本完全与第一件抄本一致, 但是只是它的一部分 (对应抄本 E66 的 1a-6a 页)。

另一部佚名作者所著作品 (F1) (没有标题摘录), 包含有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及其他一些王公的谱系 (10 页, 尺寸 26 * 13 厘米)。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历史以诸多作者的作品为代表。这些作者是布里亚特人族长和斋桑, 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非常注重布里亚特诺颜和喇嘛的历史, 且从 19 世纪布里亚特社会统治精英的角度来评价事件。然而, 作者无法掩盖诺颜们舞弊案件、他们对君主专制政权的袒护、对民众的压迫, 以及民众的困境。关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对布里亚特广大阶层的有益影响, 以及几个布里亚特部族由于无法忍受 17-18 世纪蒙古封建领主的压迫而从蒙古迁徙到俄罗斯的信息,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在布里亚特-蒙古人作家的历史著作中, 首先应该提到 B. 尤姆苏诺夫 (B. Юмсунов) 的著作, 该著作最为完整和最为系统地叙述了霍林斯克的布里亚特人的历史 (F88, E55, E219)。还要提到的著作有霍比图耶夫的 (F 77, D 76, 以及其他一些抄本), T. 托博耶夫的 (C366, F6, F87), 以及 Д. 达尔巴耶夫 (Д. Дарбаев) 的 (D191, G24)。Д. 洛姆博齐列诺夫 (Д. Ломбоцыренов) 撰写的色楞格的布里亚特人历史方面的著作 (D191, G24)。

在我们的收藏中还有布里亚特-蒙古人历史方面的其他一些资料, 例如瓦姆博齐列诺夫 (Вамбоцыренов) 族长关于霍林斯克布里亚特人土地规划的报告 (E222, 10 页, 尺寸 22 * 36 厘米), 关于 1812-1823 年伊尔库茨克省布里亚特-蒙古人农业发展的一些文件 (E239, 50 页, 22 * 35 厘米) 等。

在上述历史著作中给出了详细的诸王谱系, 为研究蒙古人社会制度发展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例如, 封邑的划分问题等。还有详细清晰地绘制的更为完整的专门的谱系表。

抄本 D93 是车臣汗部的王统表, 直径 75 厘米的圆形, 圆心简要列举了从成吉思汗到达延汗的数位可汗, 然后是达延汗的第 11 个儿子格呼森扎 (Гэрэсэндзэ), 及成吉思汗的 7 个儿子。他们的后代标示在圆形分割的扇形中。一些划分的小扇形中用数字标记, 对应俄语译作《蒙古游牧记 (Мэн-гу-ю-му-цзи)》中的旗的号码。

同一个盟的另一张诸王谱系表绘制在直径为 5.4 米的白色印花布的圆形上, 1915 年绘制。

一些布里亚特家族的谱系可以在编年史和专门的作品中找到, 例如, 《哈答斤部历史 (Истории рода Хатагин)》(D29, 81 页, 尺寸 17 * 11 厘米)。还有 1831 年编制的霍林斯克 11 代谱系表 (C94, 23 页, 尺寸 35 * 21 厘米) 等。

在传记作品中首先要说到的是内齐托因 (Найджитойн) 的传记 (木刻本, H281, 92 页, 尺寸 10 * 45 厘米, 其写本抄件有 C94, 94 页, 尺寸 9 * 40 厘米, 以及

F17, 132 页, 尺寸 22 * 15 厘米)。

这部著作包含了很多关于 16 世纪末 17 世纪上半叶佛教在蒙古人中传播的历史信息;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南蒙古有趣的日常生活细节、关于喀尔喀和卫拉特游牧民族,以及个别封建战争、封建主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等。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人的社会制度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трое монголов)》中使用了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资料。

咱雅班第达 (Зая-пандита) 的传记 (F86, 90 页, 尺寸 22 * 18 厘米), 同样包含有这些问题的很有价值的信息。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息。

一件大木刻本 162 (311 页) 也属于这类作品, 其第一部分 (16-163a 页) 内容是章嘉呼图克图 (Джанджа-хутухты) “转世” 传记。

在神话般的 “转世” 传记中包含有历史人物的传记, 例如八思巴喇嘛 (Пакба-лама) (1235-1280) 的, 在 31b-42a 页中详细叙述了他的生平。“转世者” 是那些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人物。其中第一部分是札巴俄色 (Джанджадагба-одээр) (93b-97b 页), 第二部分是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 (Агван-лобсан-чойданбалсанбо) (1642-1714 年, 97b-124a 页), 第三部分是章嘉罗赖毕多尔吉 (Джанджа-ролби-дорджэ-ешей-данби-донмэ-балсанбо) (1717-1786), 俗称罗赖毕多尔吉 (Ролби-дорджэ) (124a-163b 页)。他是《丹珠尔 (Данджур)》蒙古文译本的编辑之一。鉴于这些人的历史性, 上面列举出的章嘉呼图克图在中国的 “转世” 序列问题非常清晰, 这是必然的。通常这个序列不加标注。

除了关于佛教在中国和蒙古的传播信息外, 还有关于佛寺的修建、佛教著述的翻译等, 作品的这部分还报道了青海湖起义、喀尔喀岑贡贾巴 (Цэнгун-джаба) “叛乱” 等。它们无疑具有历史意义。

作品的第二部分 (164b-311a 页) 内容是中国 (被满族征服前) 和蒙古 (妥懽帖睦尔前) 方面的历史, 以及满族王朝兴起的历史。

还有专门的传记类作品: 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的, 在这部作品中以梵语的形式给出了他的名字——Вагиндра-сумати-дхарма-вади-шрибхадра (С106, 166 页, 尺寸 12 * 40 厘米), 还有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Лалита-ваджра (对应罗赖毕多尔吉) 的, (Н301, 208 页, 尺寸 10 * 52 厘米)。

接下来要说的是《Лобсан-галсан-дхамцо далайлама-ин гэгэн-у …намтар…》即《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传 [1707-1757]》(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VII] далай-ламы Лобсан-галсан-дхамцо [1707-1757])》, 由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在 1758-1759 年编撰。这是件很大的木刻本 (Н286, 卷 I, 346 页; 卷 II, 357 页+5 页, 尺寸 11 * 56 厘米), 由于某些原因, 木刻本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蒙古人的信息。

其中有些传记与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密切相关。例如, 这类作品有《Халха-

монгол-ун орон-ду ангха бурхан-у шаджин эхэ олоксан очир ану... джибдзун-дамба-ин гэгэнтан-у намтар ...》即《关于佛教信仰如何在喀尔喀蒙古人中开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О том, как в стране халха-монголов получила начало буддийская вера...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Джэбдзун-дамба-хутухты...）》（F292, 第一部分 1-39 页, F293, 第二部分 39 页, 尺寸 26 * 26 厘米; 参见 F147, H210 等）。

描述喇嘛教在布里亚特人中传播的历史最为详细的作品没有标题, 标号为 E225 (46 页, 尺寸 35 * 22 厘米)。

所有的这些作品完全可以包含在 A. M. 波兹涅耶夫对其中一部作品的正确评价中: “关于黄教信仰在喀尔喀传播的论著包含了与现实相关的相对少量的事实, 但夸耀了一系列关于奇迹的传说, 这些通常被喇嘛描述为伴随佛教最初传播的真实事件。在活佛传记中也可以看到同样丰富的传说”。

在蒙古文写本收藏中, 蒙古的和蒙古-卫拉特的法令具有重要价值。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指出了它们作为研究蒙古人社会制度史料的重要性。

根据 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定义, 这些古文献“是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真正的法律法规”, 并“代表经律法批准的草原封建法”。其中的一部法典——《喀尔喀法典（Халха джирум）》有两件蒙古文抄本。

抄本 F144, (122 页, 尺寸 25 * 26 厘米), 7 章, 土牛年 [1709] 编写 (1-96 页)。第一章内容是关于火虎年 (1746) 僧侣的增补 (15-21 页), 并添补了以下内容: 关于土狗年 (1718) 的武器、骆驼和馬的打烙印, 以及兵丁的内容 (96-101 页); 关于火龙年 (1736) 的一座寺院生活的不同方面 (114-122 页); 没有日期, 关于以罚金替代对女性的某些处罚 (122-123 页)。附录中有详细的目录 (101-104 页)。

第二件抄本 (F510) 在科学研究中很著名, 写本封面上名为《巴伦呼伦抄本 (Барун-хурэнского списка)》。这件抄本相较前者体积较大 (132 页, 尺寸 26 * 26 厘米, 每页有很多行)。

F510 中有前一件抄本的附加内容, 此外, 根据满族皇帝统治年份的日期给出了一些添加内容, 例如, 增加了康熙六十一年 (1722) 的驿差 (17-18 页); 乾隆十一年 (1746) 对偷盗的惩罚 (47-48 页) 等内容。后面是乾隆三十五年 (1770) 附加的增补内容 (129-132 页)。其他一些内容是按“动物系列”标记的, 例如水虎年 (1722) - 第 16 页, 木龙年 (1724) - 第 121 页, 等等。

К. Ф. 戈尔斯通斯基根据蒙古文写本收藏中没有的抄本 F510 出版了一些蒙古-卫拉特法律文献。我们存有另一件巴图尔乌巴什图门 (Батур-убаши Тюмень) 著作的抄本 (E83)。К. Ф. 戈尔斯通斯基没有完全阐述其内容, 不仅没有指出 1640 年法典和噶尔丹洪台吉 (Галдан-хун-тайджи) 附加敕令 (E 83, 1-26 页, 目录 9 页) 的详细条目, 也没有提到敦罗卜刺什 (Дондукдаши) 法规 (同上, 27-45 页, 目录 7 页)。此外, 这份写本还包括 1735 年 3 月 7 日安娜·约安诺夫娜 (Анна Иоанновна) 法令的卫拉特文

翻译，该法令是关于敦罗卜旺布（Дондукомбо）被批准为“卡尔梅克人的首要领导人”，及该法令的俄文文本。

清政府为蒙古部族编撰的法典，是理藩院裁决蒙古事务的准则，首次于 1789 年颁布。

在蒙古文写本收藏中还有这一文献的第二版（1817 年）（F228a）、第三版（1826 年）（F228b）。

不仅与蒙古人的政治历史有关的，而且与其社会制度发展史有关的各种信息可以从《王公表传（Илэдхэл шастир）》获得，这是一部非常详细的传记，更准确地说是蒙古、卫拉特和新疆诸王公的履历表。该传记中给出的文件全文和确切日期使其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 G42 写本包含正文（6 套 120 本）。没有标明其出版日期，但引用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指令。后面对它进行了补充，这些补充不在我们的收藏中。

旗的法令（“дурим”）无疑也令人很感兴趣。收藏品中有鄂尔多斯乌审旗（F199，12 页，尺寸 27 * 27 厘米）和今杭锦旗的（F 200，14 页，尺寸 27 * 27 厘米）“法令”副本。

还有必要指出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的法律法规和习惯法汇编。例如，由敦罗布刺什颁布的这类法规，文本和翻译已经由 К. Ф. 戈尔斯通斯基出版。

在我们的写本收藏中有一件抄本（E83，27-45 页，参见上文），在文本之前有一个详细的目录（7 页）。另一件写本（C250，15 页，尺寸 10 * 35 厘米）不仅包含了这些法令（1a-9a 页），而且还后加了日期，例如，木猪年（1815）（11a 页），土虎年（1818）（116 页）等。最后一个补充涉及铁蛇年（1821）（15a 页）。К. Ф. 戈尔斯通斯基提到过这件写本。

在蒙古文收藏品中包含有一些布里亚特法典：1）1808 年的霍林斯克族的 11 条法令汇编和使用指南（G80）；2）1823 年的霍林斯克法典（E214）；3）1841 年的色楞格和霍林斯克布里亚特人的法典（E240）；4）1851 年霍林斯克的法典（E241）；5）1823 年色楞格法典（G23）；6）1823 年色楞格族的 18 条法令和关于税收摊派的法令（G82）；7）《西伯利亚异族人管理章程（Устав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сибирских инородцев）》，1822 年，（D22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西伯利亚异族人草原游牧法规汇编（Свод степных законов кочевых инородце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1841 年，445 页，尺寸 22 * 18 厘米。

关于所有这些资料，要提到与之有关的布里亚特人抄本《1853 年喇嘛条例（Положения о ламах 1853 г.）》（D205，D219），还有这一主题的其他一些资料（例如《关于 1905 年的喇嘛新规草案（Проект нов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о ламах 1905 г.）》E40，以及 D199、E38 等。

这里还有一些关于扎仓和扎仓章程的各种资料；喇嘛，杂役等的名册；关于财产，图书馆构成，教学系统等资料（E179，E182，E183，E184，E234，D183，G3等）；还有各种各样内容的档案资料集（D217）。

除了上述法典和习惯法汇编外，蒙古文写本收藏中还包含有大量各种司法和行政问题，以及案件方面的官方往来信件“底稿”（副本）和某些公文合集（F208，F244，F310，F403，F404等）。其中一些篇幅相当大，例如车臣汗部合集（F523），264页，尺寸27*24厘米。还有许多单独的官方文件，这一方面的有E105，E107，E97，F399等。文件F375-381，以及A35，F396等是服驿差方面的写本。

更为令人感兴趣的是18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与中国边境事务方面的一些文件，其中可以指出几封写给奇科伊监狱指挥官И.Д. 布霍利茨（И.Д. Бухольц）（蒙古文中的Tsukhu-bayshin）的信件。外事厅的一位官员诺桑（Ношан）在一封信（E125）中要求不要拘留抵达恰克图的大使，而是提供前往奇科伊监狱之行。该文件很可能是指Н.Н. 班特什-卡缅斯基（Н.Н.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提到的“中国人送给俄罗斯人的10万件礼物”：“蒙古事务顾问诺桑将这些礼物带到了恰克图，通知色楞格的指挥官布霍利茨为他们提供补给”。

另一份外事厅文件与Л. 朗格（Л. Ланг）商队遇到恐怖袭击采取的措施有关（E144）。在文件F369中也提到了朗格商队。

在喀尔喀车臣汗的信件（E142，E178，D155）中提出了引渡投敌分子的要求。在喀尔喀土谢图汗（тушету-хан）旺札勒多尔济（Ванджил-Дорджи）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从外交部向俄罗斯参议院发邮件的规章（F382）。信件（D153，D154，F370）中有收到的各种公文，以及进一步的派遣。致色楞格盟盟长亚科比耶（Якобие）（F371，F372）的信中涉及个别边境问题。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写给商人斯皮里东·利瓦科索夫（Спиридон Ливаков）的保护信的蒙古文翻译，标注的日期是7205年，即1697年（D178，1页，尺寸55*44厘米）。

在私人通信中，最有价值的是写给О.М. 科瓦列夫斯基（F416-F505）的一系列相当重要的信件。19世纪后期的文件中有来自内蒙古几位王公的非常有趣的信件，关于他们收到的钱款和新借贷问题（E126，E127，E128，D157，D159，D160，D161等）。

蒙古文写本收藏中20世纪方面的资料只有个别一些文件。这一类的有：由于蒙古国的建立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登基，喀尔喀王公向乌尔金的赛义德桑德王（Санда-ван）提出返回中国的提案的抄本（E163）。尽管蒙古国成立了，但是杜尔伯特诸王公仍给中国当局写的一封与中国保持团结意向的信（F263）；帕尔塔王（Палта-ван）给西部蒙古军队指挥官扎勒堪扎活佛（Джалхандза-хутухта）的信中建议不要进行军事行动（F412）。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资料仅限于这些和其他一两份关于1911-1912年民族解放战争的文件资料。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收藏资料中关于1918-1920年布里亚特蒙古革命斗争的资料

非常少且零碎。它们主要涉及霍林斯克盟的征召事宜、禁止向 21-24 岁的人发放护照等 (E223/37-45)。

根据 В.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说法, 14 世纪至 17 世纪蒙古人社会制度的一些信息来源是“民间文学作品, 特别是蒙古英雄史诗”, 以及“具有极大意义的《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 (Сказание об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藏品集中有其卫拉特文本 (D67, 8 页, 没有标题)。

在 В.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出版和翻译的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的作品中, 我们有《布姆额尔德尼 (Бум-Эрдэни)》(F61, 160 页) 和《达尼库日勒 (Дайни-Кюрюль)》(D92, 4 个笔记本, 共 246 页)。

史诗传说还应该包括《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двух скакунах Чингис-хана)》, 有几件抄本: 一件 (B221) 出自鄂尔多斯, 另一件 (C497) 出自喀尔喀, 还有几件 (C413, C497), 从拼写法和笔迹来看是布里亚特人的抄本。

这类作品还包括《罕哈冉贵传 (Повесть о Хане Харангуй)》, Г. Д. 桑席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 对其定义为“可能是同名作品口头英雄史诗的书面修订版 (未必是一种简单的改写) ……”。在他看来, 编年史《罕哈冉贵 (Хан Харангуй)》……这不是民间 (口头) 史诗的简单记录, 而是模仿口头史诗的作品, 是诗歌中的史诗故事。毫无疑问, 这份古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很罕见。然而, Г. Д. 桑席叶夫认为, “《罕哈冉贵》——7 个世纪以来 (从 13 世纪初到 1921 年) 唯一书面原创艺术作品的例子”显然夸大其词了。首先, 有必要指出的是《罕哈冉贵传》在蒙古西部也是众所周知的, 在 В.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收藏品 III 中找到的卫拉特抄本 (G35) 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 В.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恰当表述, 前文中还有一些可以被称为“蒙古文宝藏史诗”的例子。显然, 它们还尚未被 Г. Д. 桑席叶夫所知。

蒙古英雄史诗最重要的作品是《格斯尔传 (Сказание о Гэсэре)》。其木刻本版于 1716 年在北京出版。文本和翻译由 И. Я. 施密特刊布。在新的译本引言中, С. А. 科津 (С. А. Козин) 将这部作品定义为“寓言性的讽刺诗, 讽刺矛头指向统治阶层——精神和世俗的封建领主, 当代纪念碑”。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格斯尔史诗的北京版本刻本 I83 有两份, 以及副本 (I61, I20)。此外, 还有包含了这部作品几个章节的一些写本, 例如, I52 (1-8 章, 155 页), I86 (1-9 章, 194 页) 等, 并且 1-7 章是北京木刻本的抄本。一些写本的内容仅是个别章节, 例如: 包含第一章内容的写本有 I2 (卫拉特文, 40 页), C9 (卫拉特文, 36 页); 第二章的有 F142 (蒙古文, 5 页); 第 5 章的有 F120 (蒙古文, 76 页); 标题为《卢布萨格史 (История Лубсага)》的作品 C296 (蒙古文, 27 页), C441 (蒙古文, 39 页), 内容上与格斯尔第六章非常近似; 第八章的有 H114 (卫拉特文, 30 页); 第九章的有 D49 (卫拉特文, 13 页), I7 (蒙古文, 26 页); 第八章和九章的有 C174 (卫拉特文, 24 页), D33 (卫拉特文, 13 页), I19 (蒙古文, 25 页)。

写本 F306 第八至十五章通常被作为北京版的延续（第八章-19 页，第九章-29 页，第十章-67 页，第十二章-68 页，第十三章-109 页，第十五章-26 页；第十一和十四章缺失）。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蒙古学者称之为“南蒙古版”的这些章节非常深刻地渗透了佛教观念，并且在思想倾向上与北京版的前七章迥异。澄清其原因是文学家当前的任务。

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写本 F312（卷 I，542 页，卷 II，430 页）引起了学者们很大的兴趣，题为《Дзамлин Сэнчин-у намтар》，即《策木岭胜钦传（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Дзамлин Сэнчина）》。它是藏文《岭格斯尔（Лин Гэсэр）》的蒙古文版（可能是蒙古文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集和研究史诗《格斯尔》资料的整个过程中，蒙古学家并未对与这部史诗有着直接关联的一些写本加以注意，虽然它们不仅存在于旧的藏品（И. 伊耶里格的藏品集 I）中，而且还出现在最近的藏品（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藏品集 III 和 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藏品集 III）中。

这些著作包含了对各种宗教仪式的描述，其中提到了格斯尔以及与佛教和萨满教有关的神灵。这些作品引起了喇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格斯尔形象的尝试，格斯尔在封建蒙古的民众中非常受欢迎。

除了英雄史诗外，对于蒙古人的社会制度研究，根据 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评论，民间文学作品中最为有意义的是谚语和俗语。这种民间创作类型例子的写本在蒙古文写本收藏中仅有 E42（16 页），以及 B246（1 页）。写本 D136（4 页）内容包括一些谚语和谜语。记录有谜语的写本也非常少。除上述写本外，还有 D40（11 页）、F269（6 页）、B139（4 页）、F532（2 页），以及 F536（24 页）。歌曲创作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不仅有一些单曲资料（D126，D31，E86 及其他一些），还有一些蒙古歌曲合集（F260）、布里亚特歌曲（C358），以及卫拉特歌曲（D39，D6，D45 等）。其中有一些是 А. М. 波兹涅耶夫抄录的原本——E56 和 E4。诗歌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大，大部分是佛教教义内容（C458，F159，B39，C200 等）。

借用一再出现在封建蒙古的蒙古文学作品中，可以提到著名的短篇小说集《阿尔吉布尔吉（Арджи Бурджи）》（C524，C11，C152 等），《比格尔木吉德（Бигермиджид）》（F154，F184），《格斯尔汗（Гэснэ-хан）》（H123，I53）和《尸语故事（Шиддиту-хур）》（I3，F214，C82）。

还要提到合集《Улигэр-ун далай》，即《譬喻之海（Море притч）》（K5，K12，I198 等）——藏族《Дзан-луна》的蒙古文版，以及《Улигэр-ун ном》，即《譬喻之书（Книга притч）》。正如 А. М. 波兹涅耶夫详细指出的那样，康熙时期出版了特别多的佛教著作，展示出这一领域非常广泛和多样化的活动。

康熙朝出版的一系列的佛教著作，在蒙古文写本收藏品中有很多件。例如：《Алтан гэрэл》，即《金光明经（Золотой блеск）》（I65，I66 等）；《Цаган линхоа》，

即《白莲花经（Белый лотос）》（I78 等）；《摩尼宝训（Мани гамбум）》（E1, E31）等。

虽然佛教文献在蒙古文写本收藏中占重要地位，但是收藏中还有其他封建文化文献。以蒙古医学著作为例，其中最为有意义的是藏语译作，例如简称为《四部医典（Джуд-ши）》（H329, H289 等）的藏医主要论著，还有一些写本（H377, H378 等），是该著作个别部分的抄本或是其中的摘录。还有实用医学手册《兰塔布（Лхантаб）》。除了一些木刻本（H287, H288; H332——布里亚特人出版物）外，还要提到一些抄本和摘录，例如 F75, E234 等。

这一主题的作品还有：《Эльдэб чихула хэрэгтү》，即《秘方杂集（Разно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е）》（D15, 42 页）；医学手册（D137, 65 页），其中包含各种药用物质的名称，并注有其用途；一份药物抄本和其治疗疾病的目录（C526, 66 页）；放血法著作（E81, 8 页）等。

只有少数兽医学方面的作品，例如关于家畜的脱臼和骨折（D20, 12 页），关于良马的特征（B177, 6 页，以及 F262, 201 页）。

如前所述，天文学方面的著作是汉文和藏文的翻译。蒙古文写本收藏中有一件（G63, 木刻本，2 套，每套 15 本）。几份历日写本中提供有天文学方面的信息，还有少量占星术方面的信息。例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历日（G44），光绪二十九年（1782）的历日（C427）。

值得注意的是闻名于蒙古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藏语名称为《历法（литэ）》的一些小作品。这些历日，除了有关月份和数字的信息外，还包含按月份和日期划分的自然现象（河流冻结等）和野生动物（鸟类到达和离开等）的信息。我们收藏中的这些作品大部分来自布里亚特-蒙古（B225, B138, D188 等）。

有很多带有“吉”和“凶”日期标记和标志的汇编等（C66-12 页，B162-25 页，C401-9 页，还有很多其他的）。

占卜方面写本的数量非常可观（C96, C397 等），预言方面的有 B83、C175 等，咒语方面的有 C293、C156 等。

民族学的资料中有关于举行仪式的描述说明：马奶祭酒（C328, D36, C334）；洗礼（C385, B15），“达拉拉嘎（далалга）”仪式（“招引”幸福和顺遂）等。其中少数几件纯粹是萨满教的，在很多情况中喇嘛教的影响非常明显，喇嘛教接受并利用了符合自身利益的萨满教的神、信仰、仪式等。我们在一些专门祭祀方面的作品中注意到同样的事物：腾格里（B175, B206, C148 等），火（C147, C321 等），“白老翁”（B149, C117 等），以及其他一些。

蒙古文写本收藏中的旅行描述很少。这类的有卢杜布·安达加耶夫（Лудуб Андагаев）前往西藏和尼泊尔旅行的非常简短的文章（D71），及其不同的版本（D199）；鲁布桑·米吉德（Лубсан Мижод）的（F92, D75, D204），Д. Д. 扎亚耶夫

(Д. Д. Заяев) 的 (G34)。

语法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不仅有《蒙文启蒙 (Джирухэн-у толта)》(木刻本 H19, H195 等; 抄本 C379, E30 等), 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 例如: “Хэлэн-у чимэг”, 即《蒙文文法 (Украшение речи)》(木刻本 H120, 写本 F52)、管旗章京喇穆苏荣 (дзахиракчи-дзанги Лхамасурун) 的语法 (没有标题) (G74, 31 页)。所有这些主要都包含有咱雅班第达^①“发明”蒙古文字的传统信息, 关于捌思吉斡节儿 (Чойджи одээр) 的“改进”等, 以及一篇关于蒙古文语音的概述。

《蒙汉满字典》(Монгол усуг-ун хурияксанбичик) (G78, 1 套包含 5 本, 其中一本是引言, II-IV 套, 每套 4 本); 《藏蒙字典》, 缩写名称为《Догбар лава》(G39), 等等。

蒙古文宝藏中除了上述列出来的写本和木刻本, 还有其他一些对于研究蒙古语言和文字特别有意义的资料。这些首先是出自哈拉浩特的 13-14 世纪的蒙古文写本, 由 П. К. 科兹洛夫 (П. К. Козлов) 带回, В. Л. 科特维奇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简述, 这些尚待研究。还有必要提到 А. М. 波兹涅耶夫给出了描述和研究的土默特俺答汗 1580 年文献。

综上所述, 必须认识到蒙古文写本收藏中包含有大量的写本和木刻本, 这些写本和木刻本涉及蒙古人最为多样化的历史和文化领域。因此, 很难同意 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的观点, 他认为“亚洲博物馆的蒙古文和卫拉特文写本和木刻本的主要价值和科学意义在于它总体上阐明和描述了蒙古文的整个时期”, 熟悉蒙古文写本收藏的内容后, 可以看出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这一点。收集最为多样化的作品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及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 本译文得到西北民族大学教特根教授的诸多帮助, 特此致谢!

^① 原文中此处为“Сакья-пандита”即萨迦班智达, 但根据文意和史实, 应当是“Зая-пандита”即咱雅班第达——译者注。